

厚植文化自信 推动文化振兴 文“活”农耕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

“如果不经过艺术或文学的描述,我们可能对自己所处的生活一无所知。”

这句话出自贾樟柯的纪录片《无用》,影片讲述了机械化服装生产的背景下,一个叫马可的设计师不满于市场的千篇一律,带着手工制衣的理想,开始创建个人品牌的故事。“我觉得手工的东西传递的是一种情感。一针一线感情的投入,和大工业流水线上的作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镜头里,年轻的设计师一字一顿地说。

而镜头一转,在马可采风的山西农村,却是工业化生产冲击下,手工制衣行业的窘况。镇上的裁缝改进了煤矿。他算了笔账:自己做一件西服的成本在40元左右,而在县城买一件工厂生产的西装,只要30元,这件事促使他反思这个行业的价值。

在高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,传统的手工制衣还有存在的价值吗?未来的它,是否只能安放于博物馆或是艺术家侃侃而谈的理想中?对于这些问题,电影并没有给出答案。

如果说,影片中设计师追求手工制衣的理念是一种艺术化的尝试,那么在今天的乡土大地上,有另一批人也做出了另外一种尝试——经过了艺术或文化的描述,在世俗生活里创造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,让市场多一种选择,也让制衣者生活得更好。

他们有的是非遗传承人,有的是艺术家,更多的只是普通的农村妇女。走近这些人,听到他们的往事,我们也惊奇地发现,传统并未走远。它以一种更加艺术化的方式传承下来,书写着古老又新鲜的故事。

摩梭人

1964年出生的阿七独支玛,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也是宁蒗县永宁乡温泉村里第一个初中毕业的女性。

见到独支玛是两周前,“今天晚上你们在这里住,晚上用火塘给你们烧烤。”眼前的妇女眼神明亮、清瘦干练,有着高原赋予的黝黑肤色,是那种典型的“摩梭阿妈”。与众不同,虽然年近六十,她却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

阿七,是家族的姓。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记载,摩梭人在永宁定居有1500多年。这个世代代代以种地、放牧、织布为生的民族,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后的母系文化。摩梭女人勤劳能干的声名由来已久,独支玛就是如此。“平时我都在这里,干活、织布,给妇女做纺织培训,每天停不下来。”

摩梭女性自古就有纺织传统。“以前的女人基本上手都是不停的,走路也在捻线。全家的衣服都要母亲来做。”她说,“如果做得不精细,老大穿完再给老二穿的时候,就破掉了。”在她的记忆里,织布裁衣的手艺,是摩梭女人代代相传的,“母亲和姥姥怎么学,我就和母亲怎么学。”

在没有棉线以前,摩梭人就就地取材,用山上的麻和火草捻线做衣服。独支玛告诉我,她小时候穿的麻衣,要经过晒干、泡水、去皮、绕线、水煮等十道工序,做一件衣服耗时几天。直到后来逐渐通车通商,当地人才用上更加轻便暖和的棉毛衣料。

在村里,独支玛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动手能力,做东西学得快,做得也精巧。20世纪90年代后,泸沽湖一带开始有了背包客,很多人看到她用麻线做的包袋、饰物都非常喜欢,就经常有人买来当纪念品。

2001年,几个日本学者跟随昆明的高校老师来做田野调查,几个人一眼便看中了她做的麻制衣服。“当时他们说,像这种手工做的麻衣,在别的地方已经很难找到了。”

询问一番之后,学者便跟她沟通,想买回去收藏。问到价格,独支玛说,你看着办吧。“他们问我,做这个东西需要的时间和人力是多少,大概估算了一下。最后给了价格,一套女士的上衣下裙3800元,一套男士的上衣下裤1000多元。”在当时,几千元不是个小数目。她说,那个时候心里高兴坏了,没想到可以值这么多钱。

从那以后,年轻的独支玛忽然有了一种自信,原来以外人的眼光来看,摩梭人传统的衣饰和手工艺品是独特而珍贵的。那时候,她正在温泉村任职村委员会主任,就利用下乡的时间从附近村民手中收集一些麻线,“一有时间就赶紧做。”

2000年以后,来丽江古城和泸沽湖的游客越来越多,“好多人来了就说,我们来看了泸沽湖,吃了土鸡,喝了当地的酒,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带回去。”但只要看到了阿七家的手工艺品,不少游客就会兴奋地买上许多。“一个人买五六个的都有,回去带给亲人朋友。”

那个时候,来丽江古城的游客几乎人手一件摩梭手工披肩。2010年前后,独支玛和丈夫周五去丽江市区买上四五百斤的棉线,周末发给妇女们做,等到下个周五,就把做好的成品卖给古城里的商户,再买棉线回来。温泉村距离丽江市区200多公里,每周跑一趟,可以赚五六千元不等。当时有大概68户、168名绣娘参与纺织,“妇女们都争着学织这种披肩,积极性很高。”

手工披肩

独支玛的儿子尼玛次尔告诉我,很长一段时间里,自己和弟弟的学费都是出自母亲卖手工艺品赚的钱。虽然独支玛的初衷也是为了补贴家用,但随着市场的繁荣,她就想带着周边会织的妇女一起做。

摩梭人的家族集体意识强,“谁家看不起谁,谁家小孩没钱交学费了,不可能看着她们不管。”独支玛也会把到手的货款先发给急需钱的妇女,剩下的等下一批再发。而手工纺织的兴起,也让当地许

一针一线织就锦簇生活



传统的回归,就在自然而然的变迁里发生了。



①阿七独支玛(右)教摩梭妇女纺织方法。②摩梭非遗博物馆里的织布机。③文芳与西海固妇女创作的“第二性”艺术品。④温泉村的妇女用传统手工方式织布作业。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察,用摩梭传统纺织的方式做了一件电脑包,她眼前一亮,马上感应到,这就是自己应该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。

而这种“转化”的能力,独支玛知道自己并不具备。“我们这里不缺纺织的阿妈,就是缺少能帮我们做出产品的设计师和艺术家。”她说。

艺术家

如何用艺术解决贫穷,给予手工制作者更好的生活,这是艺术家文芳一直思考的事。

文芳1976年出生,北京人,学生时代留学法国,就读于巴黎路易·卢米埃尔国立高等艺术学院摄影系。“共和国民工”是她早期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,300块附着象的水泥砖整齐排列,每块砖上都印画着一张农民工的笑脸。

“我父亲以前是工程兵,所以我从小就对农民工这个群体感到亲切。”她说,“不管生活多苦,他们脸上老是有那种明媚的笑容,我就被他们这种乐观打动。”从那以后,经常有媒体称她为“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”,但每次听到类似的说法,文芳都觉得“很尴尬”,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为这些人做什么。

“在很多人的心里,当代艺术做的更多的是批判或表达,并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。但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。”文芳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,小时候,因为没交上两块五的补习费,她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两年。直到后来“用艺术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”之后,她开始思考,为什么不能用当代艺术的方式,为同样生活在底层的人做些什么?

2009年,文芳接触到了一个法国的非政府组织,负责人艾兰在一次宁夏西海固考察时,发现当地妇女会用手制作一种鞋垫,“就是颜色特别艳丽,甚至有点怯的那种传统北方刺绣。”文芳说,起初艾兰想把这种中国的传统鞋垫卖到法国去,帮助这些妇女改善生活,“但是一来,法国人不用鞋垫,二来,这样的项目也没有可持续性,可能人家因为你的热情买一两双就完了,不能做长。所以她们就找到了我。”

第一次来西海固是临近春节,文芳和项目组的要和妇女们集中到镇上开个会。西北的冬季,寒风凛冽刺骨,正当她和几个当地妇女挤在一辆拖拉机瑟瑟发抖时,文芳发现,坐在自己对面一个女人穿的鞋子还是夏天的单鞋。“她忽然意识到,原来

妇女

在最开始的几个展览里,作为艺术家的文芳面临一个问题,“你做这个东西到底是要求艺术性还是

要好卖?”她说,“如果好卖,那么作品不能太大,要有装饰性,适合放在家里,同时最好方便清理。以前我们有些作品确实艺术性很强,也很打动人,但更适合美术馆去收藏。这是两种标准。”

没有过多的纠结和犹豫,文芳和妇女们很快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,“这个东西只要能赚到钱,艺术性先往后靠。”直到第三年,展览和作品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资金,她们才开始转向更具有观念性和艺术性的创作。

最开始,文芳把这个项目叫做“艺术扶贫”。“作为一个社会阅历尚浅的年轻女艺术家来说,我当时觉得自己做的事就是在做扶贫。”但是三年过去,文芳自己终止了这种提法,“在这些妇女身上,我感受到自己并不是作为一个施救者,反而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很多。”

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,文芳跟妇女们说,现在挣到钱了,你们还有什么愿望吗?“她们都说,想来北京旅游。”

在随后的2011年和2012年,文芳带着所有参与项目的绣娘两次来到北京,她们作为艺术家参加了草场地展览的开幕式,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上,作为手艺人传承人,和北京市民交流。“我们一块唱卡拉OK,感受城市是怎么样的,去她们想去的各种地方看一看。”

这段时间里,文芳和妇女们创作了另一件特殊的作品,叫做“第二性”——用法国哲学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著作《第二性》的中文版图书作为材料,妇女们用纳鞋底的方法把传统的图案绣在书页上。乌龟、祥云、树叶、鱼,“白线纳白书,整整60本,特别壮观。”

在这个过程中,文芳跟她们讨论近代西方的女性主义,谈起波伏娃和萨特,妇女们给她讲自己的生育经历,聊起她们把炒热的黄土垫在身体下边生孩子;说到妇女们的家长里短,文芳听得津津有味,提到当下社会的一些新鲜事儿,妇女们也能聊上许多。

“我们的沟通没有一点儿障碍,她们不仅能理解还有幽默感,我们大家一起开玩笑可有意思了。”她说,“而且她们说到自己的时候,也并不觉得很苦,你就感到她们活得挺乐观、挺幸福。”文芳认为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。

文芳感叹于西海固妇女的智慧和生命力。有一次,一个刺绣合作社的大姐邀请她去家里看电视。“她问我,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吗?我说什么节目呢。她说,是央视10套的考古节目。她觉得把地底下古老的东西挖出来研究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,她就爱这个事儿。但其实她小学都没有毕业。”文芳说,“所以你看,一个人的思想和财富、学历往往是成正比的。”

在艺术界,许多人把文芳的艺术实践定义为“社会参与式艺术”,在参与式艺术里,艺术家的角色淡去,让位给艺术参与者,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理念。有些人这样评价她:文芳的艺术创作中,艺术家并非本体。艺术只是工具,“借由艺术,照见彼此的多元”。

西海固的三年里,文芳结识了很多这样的农村妇女,有一些成为了很好的朋友,“直到现在还在联系”。当年那个穿着单鞋的妇女,后来送给文芳一双自己亲手做的鞋,鞋底的刺绣繁复而精美,“这是她一针一线做的,花了几个月。现在就摆放在我的家里。”

婚服

两天前,尼玛次尔刚刚参加一个云南大学组织的乡土影像论坛,用影像和音频记录濒临消失的摩梭口传文化,这是他近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。

摩梭人有自己的“达巴”,也就是口传文化的传承人,像婚丧嫁娶、成人礼、祭祖这样的重要场合,都要请“达巴”来诵经,“包括我们民族创世的神话故事,民间的仪式仪轨,都在这些老人的脑海里。”尼玛次尔告诉我,有段时间,他忽然发现,周围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,如果他们相继去世,这套口传语言系统也将彻底消失。

从2018年开始,尼玛次尔开始走访金沙江附近的摩梭村落,用镜头记录下这些老人讲述的内容,回来再整理学习。“摩梭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,在我们这个镇只有7000人,整个宁蒗县也只有差不多1.5万人。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,我们至今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传统,这在全国范围来看,都是比较独特的一种文化。”他说,“但是如果现在不做这些事的话,我们的文化就会肉眼可见地消失。”

对于文化遗产的问题,文芳也有自己的观点:“抢救与传承,最好是文化发源地之内的人去做,他们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最了解,能够长期扎根在当地。”她说,“当然,还要懂一些市场和商业规则,能够与外界沟通对话。”

除了专攻影像学,准备裁缝技师证书的考试,也是尼玛次尔这几年忙碌的事。在考试的几种专业方向里,他专攻的是制版师。“等考下来,我就可以把母亲那边做纺织的妇女叫过来,培训她们做缝紉工,给我们的传统服装打版。”他说,“这样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多样化,不只会做披肩了。”

近几年,独支玛发现了一个现象,周围有些准备结婚的摩梭姑娘,开始找她做摩梭的传统服装作为婚服。“主要是本地人,外地嫁过来的也有。”她告诉我,摩梭人没有结婚仪式,只有订婚的时候,新嫁家会送给新娘买一身新衣服。以前基本上都是男方家买什么,新娘就穿什么,“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了,有些女孩就会说,我结婚一定要穿一身红色的,有些要求裙子是白色,上衣和腰带是红色。因为摩梭的传统服装有些是比较鲜艳的,看着就会喜庆。”

传统的回归,就在自然而然的变迁里发生了。离开泸沽湖的当晚,我忍不住在景区的一家小店里,买了一条红色的手工披肩。拍了照片分享给云南当地的一个朋友。他说,“有钱人,在景区买披肩。”我马上接了一句,“是手工做的那种,摩梭族传统披肩哦。”

朋友回我:“那不错,有摩梭族母亲的爱。”